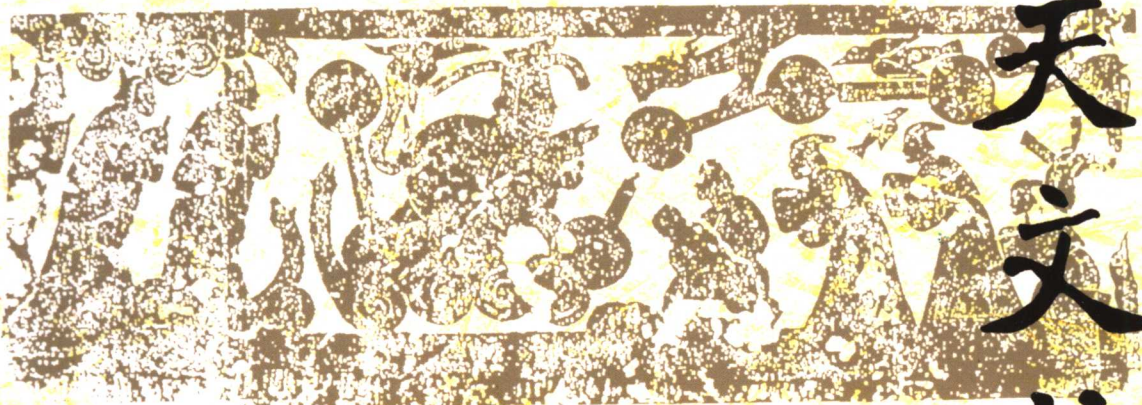


中國天文考古學

冯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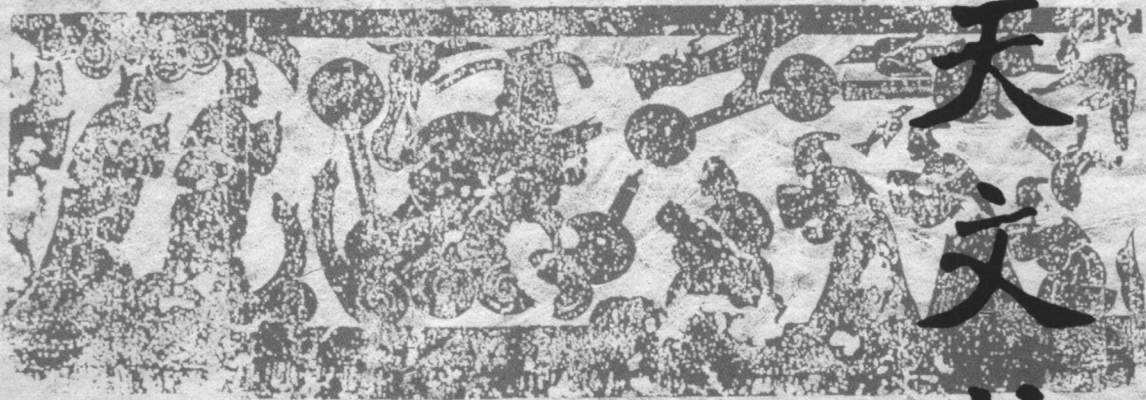


ARCHAEOASTRONOMY  
IN CHINA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天文考古學

冯时著



ARCHAEOASTRONOMY  
IN CHINA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天文考古学/冯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04-5919-4

I. 中… II. 冯… III. 天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P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377 号

责任编辑 雁 声  
责任校对 张报婕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a href="http://www.csspw.cn">http://www.csspw.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25	插 页	2
字 数	670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绘刻北斗（猪）的河姆渡文化斗形陶钵



3. 新石器时代骨制律管



2. 红山文化玉龙



4. 绘刻星象的新石器时代陶尊

图版二



1. 雕有猪首图像的良渚文化玉琮



2. 陶寺文化陶盘上的勾龙社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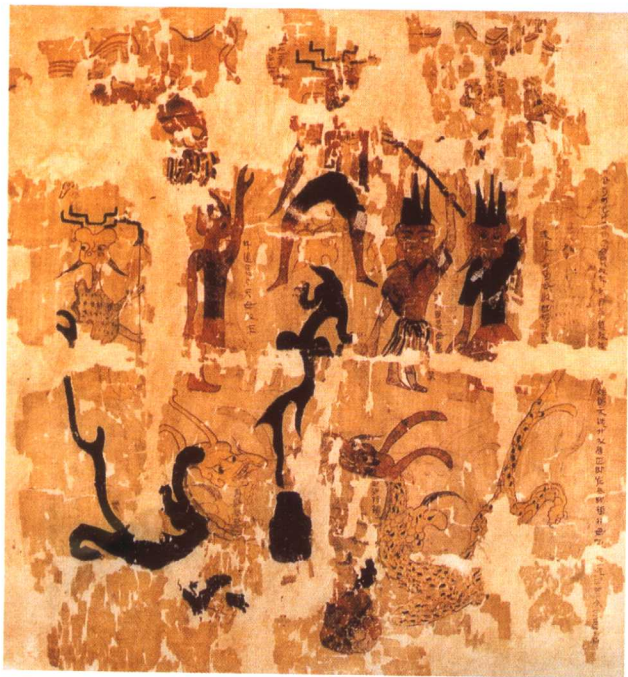


3. 云南沧源崖画日中立射图像



4.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太一神徽





1.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社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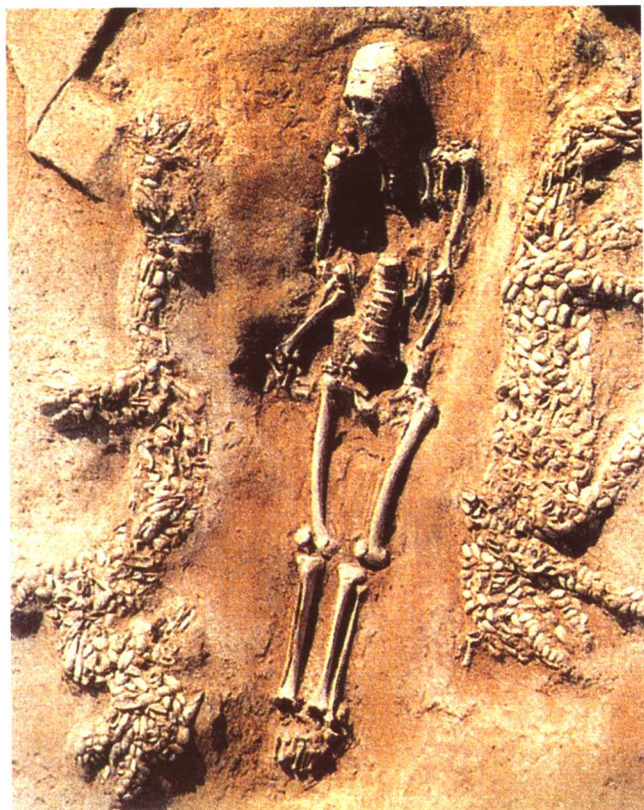


2.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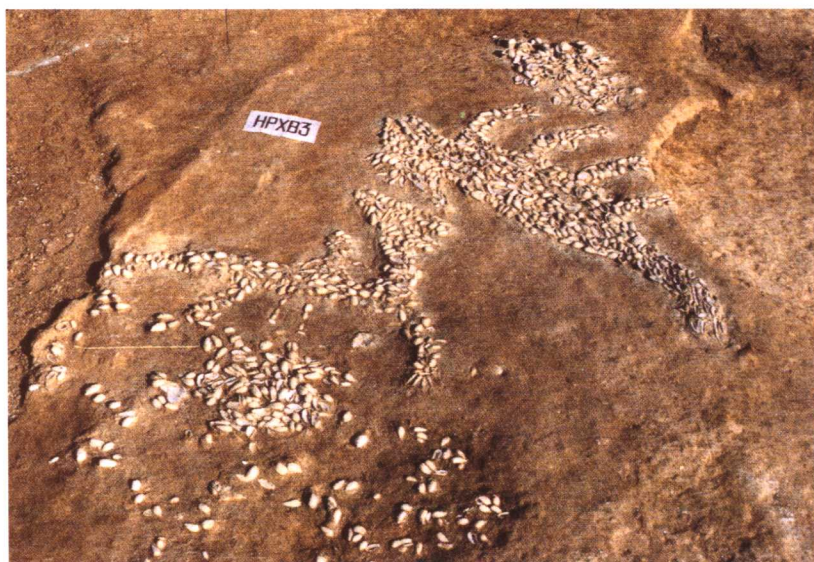


3. 战国曾侯乙墓漆箱盖面天文图

图版四



1. 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  
仰韶文化蚌塑星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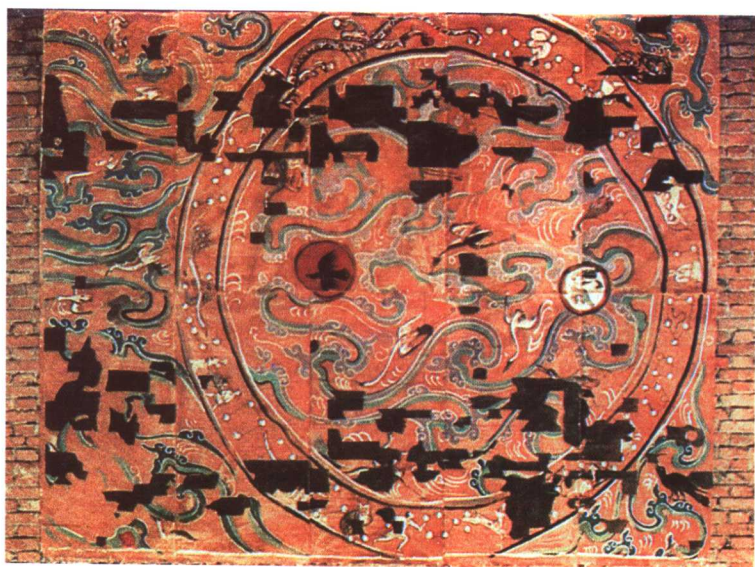


2. 河南濮阳西水坡第三组仰韶文化蚌塑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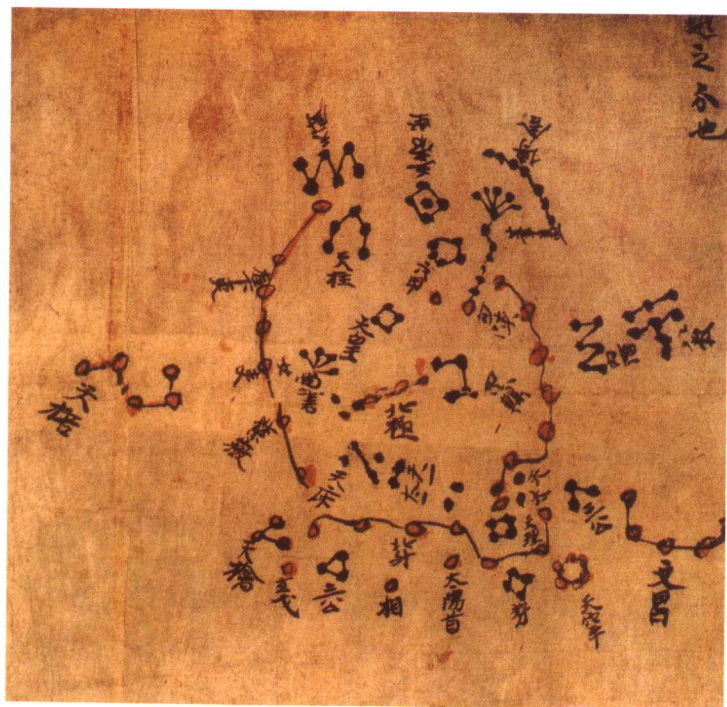


1. 洛阳北魏墓室星图



2.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象图





1. 敦煌卷子唐代星图（甲本）



2. 河北宣化辽代墓室星象图





1. 红山文化圆丘



2. 红山文化方丘





1.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新石器时代洛书玉版



2. 夹放洛书玉版的玉龟

冯时同志的专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以考古学、甲骨文文学、古代文献和民族学等史料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诸重要问题，多有独到见解，初步构建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

——任式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该研究成果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天文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得了诸多可喜成果，展现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作者首次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基本框架，为该分支学科的成立打下了重要基础，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性质。该成果较已有的零星研究具有系统性强、涉及面广和更为深入的特色。作者的新见解或可补前人研究的空白，或可成一家之言，大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从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近年来最主要的进展之一。

——陈美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冯时同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是以研究中国天文史的考古遗迹和遗物为对象的中国考古学分支学科——中国天文考古学的专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伴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而逐渐发展，但此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仅限于“个案”。冯时同志在总结前人有关天文考古学具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初步建立了中国史前天文考古学的学科框架，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



体系，这主要反映在作者对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的科学界定，研究范围的明晰确认，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系统阐述，学科任务与学科发展及主要课题的准确提出。《中国天文考古学》在中国史前天文考古学方面研究的重要突破，有着学科奠基性意义，同时也推进了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天文考古学是一种新兴的交叉学科，过去尚无学者作系统的论述。冯时在书稿中，从论述学科思想入手构筑学科体系，讨论该学科的理论特点、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课题，以及发展历史等诸多问题，对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益的。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冯时同志独立完成《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难度较大的科研项目，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书稿表明，他在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和天文学方面，都具有颇为坚实的基础，掌握资料相当充分，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富有创见和钻研精神，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王世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再版自序

关于古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学者已有很多讨论。然而在今天中国考古学空前发展的情势下，所谓的“二重证据”显然已不能再是文字与文字的互证，而更应包括对古人留弃的遗迹和遗物等实物史料的研究。很明显，新学问的创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这意味着新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的史料学，而考古学不仅能为我们提供前所未见的文字史料，更能提供崭新的非文字史料，因此，考古学对于新史学的建立与推动作用是颇为独特的。

天文考古学研究首先需要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探讨古代先民的天文思想和天文活动，进而深入于上古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研析。这些工作当然有助于考古学完成其关于古代精神文化的重建。事实上，天文考古学展现着对古代人文与古典科学的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它使我们学会从天文学的角度，在更本质的层面研求文明起源的动因和发展脉络，从而直探人类思维的原始及文明的初基。本书正是为实践这一学术目的而进行的探索。

中国人对于天的理解与天人关系的阐释直接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形成，而天文考古学对于探讨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和意义。古代的宇宙观必须建立在先民对于时空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天文学不仅是古代科学的渊藪，同时也是文化的渊藪。这些认识我已在本书和继之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做了系统的论述。

本书自出版至今已历五年，距书稿杀青甫就也逾八载，其间不仅又陆续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足资研究利用，而且我对一些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观点间有修正和补充，其中两点认识不同于旧作，需要在这里做特别的说明。

第一，初版第二章第二节之一有关甲骨文“巫”字构形的解释，本系采



择张光直先生矩尺交合之说，并据《周髀算经》所载古人合矩为方的用矩之法周加圆通。但深思之后，则颇觉未安，故于《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书中提出新的看法。简而言之，尽管“合矩”的形式可以通过将两支矩尺的垂直叠交而完成，但我已不认为“巫”字取形于这种做法。因为在殷人的观念中，方位之“方”与方圆之“方”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巫”字只与方位的涵义相关，却与方圆的意义无涉。况且殷巫之官以“戊”命名，也与矩尺不合。

第二，初版第三章第三节之二涉及古代太阳历的讨论，曾怀疑郑州大河村出土仰韶文化彩陶所绘十二个太阳的图像可能与太阳历有关，然而金沙遗址太阳四鸟金箔饰的出土则使这种怀疑必须被放弃。理由很简单，金箔饰以太阳十二芒暗喻十二月的事实是清楚的，因此，古人以“日之数十”应合十天干，为阳历系统，又以“十二”应十二地支与十二月，属阴历系统，自成传统。显然，这些史料应该反映了阴阳合历的起源情况。事实上，中国古人所具有的传统的阴阳观念正是他们选择这样一种历法制度的根本原因。有关问题，我在近撰《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中则有论述，已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所八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史新论》。

至于其他一些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凡有可羽翼旧说者，也扼要介绍如下。

初版第三章第二节之四有关新石器时代礼器图像中猪母题的天文学阐释，详细论述了上古先民以猪比附北斗的传统观念，这种认识不仅获得了新的考古资料的印证，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红山文化猪形北斗遗迹的研究，更明确证实了我们对于北斗阴阳观念及交泰思想的认识。相关研究已撰成《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和《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研究》两文，前者曾于2004年10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宣读交流，收入《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后者则刊发于《考古》2005年第1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青、赤、白、黑、黄五色分别配属东、南、西、北、中五方的观念何时产生，向为学术界所关注。考古学如果能够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确凿物证，那么对于追溯这一体系的起源年代当然为传世文献所望尘莫及。事实上，红山文化的猪形北斗遗迹不仅显示了先民对于阴阳的思辨，同时也体现着五色配伍五方的观念，其史料的存留与鉴别极其难得，对于探讨传统的方色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关问题，我在《天地交泰观

的考古学研究》中已有讨论。

初版第四章第四节有关早期漏刻制度的讨论，囿于史料，颇难稽考。后作《殷代纪时制度研究》，发现商周甲骨文、金文“录”字实即当时掣壶之象形，于早期漏刻制度的研究或有帮助。是文已载《考古学集刊》第16辑。

初版第六章第四节之二探讨西水坡45号墓殉人与分至四子的关系，根据发掘简报，虽论及墓中所殉三子应为二分神及冬至神的象征，但夏至神的阙如却始终是一个问题。尽管我推测墓地中的31号墓主可能与45号墓中缺失的夏至神有关，因为他的胫骨已被特意移入45号墓而作为北斗的杓柄，但苦于没有其他证据，只得存疑待考。2003年春，我借赴濮阳之机，曾就31号墓于墓地中的具体位置问题特别请教发掘主持人孙德萱先生，始知该墓实与45号墓及另两处蚌塑遗迹实同处于一条南北子午线上，而且四处遗迹均呈等间距分布，从而印证了我的判断。孙先生并提供给我西水坡遗址的总平面图，使我对诸遗迹的分布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样，31号墓必须与45号墓和第二、第三组蚌塑遗迹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事实便清楚了，其作为夏至之神的象征，已成为西水坡这座完整的原始宗教遗迹不可或缺的部分。显然，遗址中分至四子的遗迹不仅完整，而且体现着古人对于分至四神的丰富的文化理解。有关问题我已撰成《四子神话的考古学研究》，收入拙作《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此外，初版第二章第二节之二有关上古天极的讨论，曾根据考古资料与文献的互证，探讨了古代的天极观以及作为天极的璇玑。后在撰写《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时，逐渐领悟到古人对于天极中央呈现凸耸的璇玑的认识，除去客观的观测印象之外，帝廷观念的建立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准确地说，上帝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就需要他在空间上区别于帝臣，而璇玑的顶点高于天盖，正好可以借此建立起天帝的神威。这种上古天文观与宗教观的相互阐发，正是中国早期天文学的特点。

当然，帝廷的建构也直接影响到四象体系的最终建立。我们已经指出，原始的四象体系以龙配东宫，虎配西宫，鸟配南宫，鹿配北宫。待阴阳观念渗入天文学后，鹿则转变为麒麟而具有了阴阳致养的色彩。而古代的帝廷观念显然适应着五方的观念，其中社神作为帝五居中位居中央的一神，具有着与天帝同样的化育万物的权能，而这种权能自然需要通过一位具有阴阳相生能力的灵物来体现。事实上，古人对于阴阳合和以生万物的思想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本具阴阳属性的麒麟才由北宫之象转配

为中宫。然而，北宫作为方位、五行、历算的起始方位必须体现阴阳的思想，于是古人进而创造出具有阴阳象征的玄武。如此，五官的配置终于完整，四象的体系也最终定型。

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上古政治史、宗教史、思想史及科学史的认知方式与认识背景，因而颇显重要。读者如欲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详细意见，敬请参看相关论著。

此次拙作再版，为保持初版原貌，惟重订正文字，补苴罅漏，个别史料或有增删，书中观点则几仍其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主任不仅为本书的再版给予多方赞助，且于书中第六章“中国与印度二十八宿对照表”中印度宿名的梵文译写有所是正，使我重取 W. Brennand 于 1896 年及 P. D. Sharma 于 2004 年出版的两种《印度天文学》(*Hindu Astronomy*) 所载印度二十八宿资料与此表复作核校修订。附识于此，谨誌铭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楠女士校订了拙作英文目录，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冯 时

2006 年 10 月 7 日

记于尚朴堂